

情报术

(美) 艾伦·杜勒斯 著

胡家炜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情 报 术

(美) 艾伦·杜勒斯著

胡 家 炜 译

(西 德 美 德)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艾伦·杜勒斯,长期从事间谍工作,先后达四十五年之久。他一直负责美国国外情报工作。1951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任局长,1961年退休。这本书是他退休后写的。书中透露了美国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些手法,同时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恶极力掩饰和辩护,对于“自由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倍加吹嘘。我们稍加删节后译出,仅供领导同志和有关单位了解和研究美国在国外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参考。

ALLEN DULLES
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

本书根据美国哈泼斯月刊 (Harper's Magazine)

1963年4月号译出

情 报 术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75印张 67千字
1964年11月第1版 1981年7月贵州第2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 0.28元

目 录

第 一 章

- 一、我的简历..... (1)
- 二、什么事情需要保密..... (3)
- 三、导弹时代的情报需要..... (5)

第 二 章

- 一、历史的教训..... (9)
- 二、美国历史上的教训..... (11)
- 三、赫鲁晓夫的国外耳目..... (14)
- 四、纯粹的苏联人..... (18)
- 五、间谍的特权..... (20)

第 三 章

- 一、公开的情报工作..... (22)
- 二、秘密的情报工作——间谍活动..... (25)
- 三、打进去——“安钉子”..... (26)
- 四、训练“冒名顶替者”..... (30)
- 五、拉出来..... (31)
- 六、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向往西方的“志愿人员”..... (34)

第 四 章

- 一、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进行情报工作..... (38)

二、利用U-2飞机	(39)
三、侦听	(40)
四、破译密码的工作	(41)
五、拆阅正人君子的信件	(42)
六、切勿把破开敌人密码的事泄露	(43)
七、破译外交密码	(44)
八、情报工作的指挥	(45)
九、自由的社会和不自由的社会	(48)

第 五 章

一、反间谍工作	(51)
二、渗透法	(52)
三、挑拨法	(54)
四、逆用手段	(55)
五、外线监视	(57)
六、策反工作	(58)
七、迷惑对方	(61)
八、设计骗局	(63)
九、轰炸机绕圈子飞行	(64)

第 六 章

一、如何分析、判断和整理情报， 力求把正确的情报及时送给领袖	(68)
二、鸭绿江、苏伊士运河、猪湾	(73)
三、并不纯粹是一门科学	(75)
四、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颠覆活动	(76)

第七章

一、中央情报局的性质	(79)
二、总统的责任	(80)
三、审查和报告制度	(81)
四、缄默贵如黄金	(84)
五、献身之所	(85)

第一章

一、我的简历

我很早就对世界事务感兴趣了，童年时代就孕育着这种兴趣的萌芽。早年，我祖父从波士顿到印度马德拉斯去传教，乘帆船航行一百三十一天，途中历尽艰险，几乎失事遇难；他这个惊险的航海故事给了我深远的影响，我可说是沐浴在这个故事的气氛中从小长大的。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和我的外祖父母在华盛顿度过的。我的外祖父约翰·W·福斯特(John.W.Foster)，1892年在哈里逊(Harensen)总统任内作过国务卿。他在内战中服役后被擢升为将军，以后又曾出使墨西哥、俄罗斯和西班牙。我母亲的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度过的，我父亲也在外国上过学。我就是在这个经常议论国际形势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我最早搜集的是西班牙和南非战争的材料。1901年我八岁的时候，每当祖父和他女婿、后来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任内作过国务卿的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热烈议论英国和南非战争的功过得失时，我就贪婪地倾听着。我别字连篇地写下了自己泼辣的看法，这些看法受到了长辈的赏识，并把它印成了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在华盛顿地区竟成了“畅销书”。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是站在“失败者”一边的。

大学毕业以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由于对当时迫在眉睫的这场大战还和一般人一样茫无所知，我开始了我的环球事业旅行，先是在印度、然后在中国教书，还在远东地

区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1915年我回到美国，在美国参战前一年开始进入外交界服务。

其后十年，我陆续在一系列饶有兴趣的岗位上工作。首先，1916—17年，我在奥匈帝国目睹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开始崩溃。美国参战时期，我在瑞士搜集德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战线的敌后情报，事实上，我当时与其说是个外交官，倒不如说是个情报官。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讨论凡尔赛和约时，我参与划定了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并且参与研究俄国革命和中欧的战后和平安排问题。和会结束后，美国于1920年在柏林派驻了战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我是这个使团的成员之一。到君士坦丁堡作过一次业务旅行后，我在国务院担任了四年的近东科科长。

那时，1926年，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虽然还没有衰竭，可是钱包却空了，于是转而执行律师业务；其间又曾出任公职，在国联限制军备会议上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在这次工作中，我见到过希特勒、墨索里尼、李维诺夫以及英法的领袖。

1941年，当战争威胁美国的时候，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总统召威廉·杜诺万（William·J·Donovan）上校（以后晋升少将）到华盛顿，要他组织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彼尔^①·杜诺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情报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称为美国现代情报工作之父，我觉得是可以当之无愧的。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他要求我参加他的工作，从此我就一直跟他在一起，直到对德、对日战争结束。

在这紧张的四年里，我主要是在瑞士工作，德国投降后又在柏林工作。我信奉通过研究具体案例以熟悉业务的方法，当时我在这方面也确实下了一番苦功。日本投降后，我于1946年重操律师旧业。但这并未妨碍我积极参与制订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正式立

① 彼尔是威廉的略称——译注

法程序。

1950年11月，中央情报局当时的局长华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召我到华盛顿。我去的时候原以为只需要呆六个星期，不料以后在中央情报局竟一直工作了十一年。

二、什么事情需要保密

我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十多年，后八年担任局长，1961年11月退休。退休以来，我就觉得，现在正需要有人——哪怕是与情报工作有切身利益关系而又积极支持情报工作的人——来讲一讲：情报工作，作为现代政府结构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究竟有哪些事情是可以适当公开的。在所有各种职业中，为人了解最少而讹传最多的，恐怕就是情报工作了。

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1月28日主持中央情报局新厦落成典礼和与我告别时所说的一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需要有人来这样讲一讲的一个理由。他当时说：“你们的成绩不出门，你们的过失传千里。”道理是明摆着的：进行得顺当的工作你不能宣传，搞糟了的工作你不宣传它也会不胫而走。

中央情报局并不是一个地下组织。要想对建立这个机构的宗旨获得一个概念，只要读一读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就行了。它当然有它秘密的一面，法律也准许国家安全委员会——它实际上代表总统——责成中央情报局在法律特别载明的职务之外担负某些其它的情报工作任务。这些任务是不公开的，但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同样也是严格保密的。

中央情报局的经费由国会批准的专门预算支付。它的总数和每个时期的开支，国会拨款委员会的中央情报局小组委员会是知道的。由于总数不公布，许多写这方面文章的人就觉得有权自行

猜测。由于十亿美元是个很好的整数，这个数字一般也就成了他们派给中央情报局的预算开支数，但这个猜测数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我作局长时的实际总数多少要比这个夸张的猜测更使美国纳税人高兴一些。

当我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在情报工作上，我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只有那些确实需要保密的事情，才应该尽一切可能确保其机密，常识性的事情和敌友都同样了解的事情，则用不着神秘化。

我担任局长后不久，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足以很好地说明这种神秘化作法的害处。总统的兄弟密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Eisenhower)博士有事来找我。总统也想到我的机关来看看。他们出发了（事先并未通知情报局），可是找不到我的机关，最后只好给我打电话问明详细地址。当时中央情报局总部大门上的招牌是“政府印刷所”。游览汽车在环游华盛顿时都习惯于在我们的大门前停下来。然后向导就向游客大声演说，宣称在这带刺铁丝网的后面，就是华盛顿最秘密、最隐蔽的地方，美国间谍机关的总部——中央情报局。我还发现，华盛顿的出租汽车司机几乎都知道这个地点。后来我在大门口换上适当的招牌，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就随之消失。对于首都的访问者来说，我们既不再是不祥的，也不再是神秘的了。过份的保密等于自欺，一如过多的言谈招致危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诺万将军和战略情报局于1942年11月派我到瑞士，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足以说明一定程度的公开反而有利于搜集情报。我当时的掩护职务是美国外交使团团长助理。但瑞士一家大报却报导我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秘密使节。心中无底的人也许会想，这篇胡诌的意外广告可能把我的事情搞坏了。但事实恰好相反。尽管我郑重其事地适当否认了这篇报导，人们可还是相信它。结果，一大群送情报的人聚集到我

周围来了。当然其间不免鱼龙混杂，有真有假。我如果不能从中基本上分清真伪，那就是不称职了。因为，情报官员的基本能力之一，就在于识别人物。

三、导弹时代的情报需要

国务院和国防部都从国外搜集情报，他们的专家分析这些情报，提出报告，进行许多有关的工作。事情是否整个作完了呢？否，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早在十五年前就都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共产党的威胁和它的那一套什么都保密的作法，它为了准备核火箭威胁和对自由世界进行颠覆活动而搞的一些措施，都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广大地区对外都是不开放的。他们决不会轻易地把他们的军事设施情况告诉我们，而这些情况又正是我们和自由世界的防务所必需知道的。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一直拒绝限制军备和核军备的基本点——视察和监督。他们公然宣称，保密是他们的本钱，是他们政策上的基本要素。他们宣称他们有权秘密武装，以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能够发动秘密袭击。他们轻率地拒绝了艾森豪威尔总统1955年提出的开放领空的建议，那个建议，只要他们实行，我们也是准备实行的。这样一来，就给情报机关带来了一项平衡情报差额的任务以及为此而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的任务——刺透他们的保密盾牌。

国务院和国防部公开的情报搜集工作固然有很大价值，但还不够。需要有秘密的情报工作和独特的专门技术来刺透共产党集团的公安壁垒。

我们防范突然袭击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有一个经常保持警戒、能够准确迅速地报导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动态的、严密而协调的情报工作机构。今天的世界性质说明了我们的问题。一二

十年以前，谁敢设想六十年代我们的武装部队会深陷于越南和朝鲜，古巴会变成一个与莫斯科亲密结盟的敌对性的共产党国家，而刚果又会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可是这一切全是今天活生生的事实。未来的岁月无疑也会出现同样意外的事变。

因此，我们搜集情报决不能只限于搜集当前发生危机的国家的情报。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情报。在这个核火箭时代，甚至南极和北极也成了重要的战略地区。距离和时间已经大大失去意义。海洋，过去保卫过我们，在决定性的时刻，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在防务上给了我们时间，现在，海洋仍然存在着。然而我们今天却处于前线；我们今天成了主要目标。一次突然袭击并不需要一次带有明显暴露迹象的长时间动员。导弹在发射台上，轰炸机处于待命状态中。

我们的防务需要就是这样，我们不能等到另一个强国决定进攻我们之后再着手搜集敌对行动的情报。我们必须尽力保持警惕和作好戒备。

除了在世界范围内搜集情报之外，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和分析这些情报。我认为，由一个不对政策负责的政府情报机构担负提出情报分析意见和协调情报分析工作的主要责任，是有好处的。政策制定者十分自然地倾向于陷在他们负责制定的政策框框里。而偏见正是情报工作中最严重的职业性危害。

珍珠港事变前，国内外的高级官员都认为，日本人如果发动进攻，必然是南下攻取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下腹部。人们没有考虑日本人对他们最危险的手——美国开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珍珠港事变，以及当时对已有情报的处理失当，大大地加强了我国政府以后更好地组织情报反映工作的决心。事先接到的警告虽然可能不够明确，不足以使我们的领袖精确地断定问题将出在夏威夷和菲律宾，但是，只要他们对情报加以适当的分析，

至少也可以使我们对太平洋上临头的威胁保持警戒。至于日本，袭击珍珠港固然成功了，但事实证明那是他们最大的失策。

如果有任何人对客观性情报的重要性有任何怀疑，我愿意提供历史上的其它错误事实来加以研究。这些错误，都是由于领袖们考虑不周或者对情况及其它国家的态度判断错误而造成的。1914年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进攻法国时，他的军事领袖们力图使他相信，要取得军事胜利就必须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他过于相信他们的判断，认为英国不敢参战——尽管他已经从政治方面接到过这样的警告。这是情报鉴定上的一次重大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政府由于不听丘吉尔的警告，终致对纳粹威胁的严重程度、特别是空袭的严重程度失于戒备。

同样，希特勒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犯了一系列错误。他没有估计到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后来在1941年6月对俄国开辟第二战场时，又漠视了这样作的后果。据说，1942年有人向他报告过英美的北非登陆计划，他拒绝考虑这个对他有用的情报。有人告诉我，他当时曾经冲口而出地说了一句：“他们没有船只登陆”。

一种新的、在共产党革命之前实际上无人了解的威胁，给我们的情报工作增加了一项额外的重担。这种威胁就是共产党破坏自由国家安全的阴谋，这一点，我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了解的。由于这种阴谋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我们就必须有秘密情报技术来揭露它，并且建立我们自己的防务来对付它。

在苏联，我们面对着的敌手把间谍艺术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同时把从属于它的破坏方法和欺诈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可怕的政治攻击工具。再没有别的国家曾经打算把间谍工作搞到这样大的规模了。为苏联国策所支持的这些活动，无论是在所谓和解与共处的姿态下，还是在尖锐的危机时期中，都同样积极进行着。

这种敌对活动是我们和我们盟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在消除这种敌对活动的工作中，情报机关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近来，在几个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破获了许多苏联间谍案件和破坏案件，这决不是偶然的。世界正应该了解苏联人已经了解的事情——自由国家已经建立起高度成熟的反情报组织，而且近年来在侦破苏联间谍活动上越来越有效了。当然，在某些共享秘密的国内保安措施上，我们和北大西洋条约盟国以及其它盟国有着共同的直接利益。如果一份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文件被共产党人从我们的盟国之一窃走，那对我们的危害无异于从我们自己的档案中偷走。这种情况，使国际合作成了情报工作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

我们的盟国以及许多友好的但未正式结盟的国家，对共产党威胁的看法一般是和我们一致的。许多国家都能够并且正在对自由世界的整体力量作出实际贡献，包括情报方面的贡献，以帮助我们保持警戒。当然，我们有些朋友没有条件作到他们可能想作的一切。他们希望，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如在许多其它方面，能得到美国的领导。当我们破获共产党的敌对计划时，他们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弄清对他们自己安全的威胁。我们当然也有兴趣这样作。近来情报工作最令人鼓舞的特点之一，也是情报工作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和自由世界各国同行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它使我们同命运共呼吸，因为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威胁。

第二章

一、历史的教训

历史上有不少漠视甚至轻视情报工作的事例。特洛伊国王普莱姆的女儿卡珊德拉，从她的追求者阿波罗那里得到了一项礼物——预言的才干。但是，据神话所载，一当她获得了这份礼物，她就转而鄙弃她的追求者。阿波罗无法收回这份礼物，但他能够限制这点才干发挥作用，而且确实这样做了，那就是使人们不相信她的预言。因此，卡珊德拉关于抢夺海伦将会带来特洛伊王国的毁灭的预言，以及关于有名的特洛伊木马——见于文献的最早的“情报工作”之一——的警告，都被人们忽视了。

另一次早期的情报活动见于圣经（民数记，第13章）。当摩西和以色列人流落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晓谕他说，以色列每个支派中要打发一个首领去“窥探迦南地”，迦南地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摩西遂指示各支派首领去“调查那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人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他们用了四十天时间去执行这个任务。回来向摩西和亚伦报告说：“那里喷涌着奶汁与甘蜜，那里繁花满枝、果实累累”等。执行任务的十二个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十个人都说那里的人民比以色列人强悍，说他们是“魁梧强壮的人”，“城邑也坚固宽大”，“当下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于是耶和华起誓，由于众人对他用心不诚，他们将在旷野流浪四十年，即按窥探那个地方和带回那点胆怯消息所花的四十天，一年顶一日^①。

^① 此段及下段所引圣经原文均参照上海圣书公会1931年印行的《旧约全书》译文。——译注

这项特殊的情报任务有着比乍一看来更多的含义。首先，如果一个人要对以色列的土地和人民获得一个公正无偏的概念，他就不应该派遣政治领袖去执行情报任务。他可以派出技术人员，而且肯定不应该是十二个，而应该是两三个。其次，摩西和亚伦并不需要以色列土地方面的情报，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这次任务的实际目的并不是要了解以色列的土地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地^①，而是要了解以色列各支派的成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民——强悍和值得信任否。只有两个人通过了主的考验，其他支派的首领和他们的人民则被贬黜在旷野中继续流浪，直到一个新而更强悍的世代起来接替他们。

这四十年过去以后，约书亚派出两个人进行“窥探”(约书亚·第二章)，他们在耶利哥被接纳到妓女喇哈家里。我相信这是现代情报工作行话“安全下处”见于文章里的第一个例子。接着，约书亚拿下了耶利哥并“把这城市 and 那里所有的人民彻底毁灭，只保存了妓女喇哈和她全家”。这样就立下了一个传统，即帮助情报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报偿。

整个上古时期，从赛鲁斯大帝和他的波斯军队，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罗马时期的凯撒，有效地运用情报和间谍工作，始终是军事领袖成功的必需条件。普土司国王米斯拉达梯六世（公元前120年至64年）在小亚细亚之所以能顶住罗马强敌，多少就因为他是—个出色的情报官，能运用二十二种语言和方言，又比远来的罗马人熟悉那些部族和他们的风俗习惯。

中世纪时，西欧各国的统治者都没有什么系统搜集情报的机构。他们都不大了解拜占庭王国和斯拉夫民族的情况；对穆斯林的情况，他们甚至了解得更差；而对中亚和东亚的任何情况则几

① 以色列的土地就是上述的迦南地。据圣经所载，以色列人原寄居埃及，因子孙繁衍甚众，不容于埃及法老，耶和华乃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迦南，迦南是耶和华早先答应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译注

乎一无所知。马哥孛罗 (Marco Polo's) 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有一些战略情报性的材料，但没有人认真注意它。意大利商人比任何其它阶层占有更多的东方情报，不幸他们很少有机会把它贡献给那些决定欧洲的东方政策的人。教皇不满意商人同异教徒作生意，帝王们又与这些商人没有接触。中世纪欧洲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就是与东方的关系问题。

15世纪时，意大利人由于建立了固定的驻外使馆而对情报工作作出了一项重大贡献。在他们驻外使节的报告中，特别是驻威尼斯公使的报告中，含有许多战略情报。到了16世纪，欧洲大多数政府就都模仿意大利这个先例了。

在没有地图的时代，地理就是一个问题。查清某条河上有一处浅滩，可能使一支部队突破重围；发现一条山中小径，可能打开一条突破敌阵的道路。通常可以动员土著居民提供这些情报，他们是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的。路易九世就曾给一个吉卜赛人好几千元，因为此人引导他穿过了尼罗河一条支流上的浅滩，从而使他得以向穆斯林军队发动一次奇袭。

在近代，我们发现，随着最初的情报专家的出现，间谍工作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具。这些专家就是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佛兰西斯·华辛汉爵士和伯雷勋爵，以及克伦威尔时期的约翰·特罗。这些大臣们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搜集秘密情报。

二、美国历史上的教训

但在美国历史上，直到最近都还没有什么关于政府情报活动的记载，只有战时是例外。幸亏乔治·华盛顿对秘密情报工作的价值、方法及其保密要求有明智的了解。他的保密工作确实作得很好，使我们至今都无法了解他的情报活动的全部历史。那桑·霍尔的故事是革命时期间谍活动最著名的事件——可不是成功的